

从“辞赋不分”到“以赋论赋”

——古代赋文体论述的发展趋势及当代启示

何新文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的赋文体论述，虽历经变化反复，但总的趋势仍是由探索赋与诗骚等文体的外部关系到辨析赋的内部体类，即由两汉“辞赋”不分、魏晋六朝“骚别于赋”，到唐宋以后在“以赋论赋”的前提下具体分析赋的“古、俳、律、文”诸体；同时，尚有对赋体特征及其分类的理论探索。明乎此，对于当代赋体认识及其研究均极有启示：一是从体制上认定赋为诗之一体；二是区别楚辞与赋，明确赋始于荀、宋和“辞赋”连称多单指赋而非辞与赋；三是参酌“别门类、叙朝代、列体裁”之法以分类赋体。诚如是，则能使赋体划分科学化，进而纠正辞、赋不分乃至以赋隶文的分属混乱，减少“辞赋”选注和研究的交叉重复。

关键词 辞赋不分 骚别于赋 以赋论赋

作为文体及文体概念的“辞赋”或“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一体二名，还是两种文体？在选注或评论楚辞与赋之时，应该坚持“辞赋不分”，还是“辞赋异体”？这是自两汉至今，最为聚讼纷纭的文体论难题之一：一方面，持“辞赋一体”观念，以“楚辞”与“赋”为“辞赋”或统称为“赋”的论著及选本，数量众多而影响广泛。其中，可以铃木虎雄、马积高、郭维森等三部赋史与霍松林主编《辞赋大辞典》为代表^①。这些著述，以“赋”或“辞赋”名书，却一概辞、赋兼论，将楚辞列入“赋”的范围，即明确地以“楚辞”为“赋”；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辞、赋异体”，较早者，如陈钟凡先生谓：“屈宋之作则当正名曰‘辞’，而不得目之为赋。”^②后来，台湾学者张正体力辩“赋与辞实不能作为一体”，也“不是一体二名”^③；大陆学者姜书阁提出要把屈原楚辞“同宋玉以后的汉赋那种文体‘画境’（分开）”^④。上世纪末，又有郭建勋指出必须纠正“以‘辞’为‘赋’或‘辞’、‘赋’不分的观念和称谓”。笔者认为楚辞“没有必要再置于赋的范围之内”。曹明纲表明要“首严‘辞赋异体’之辨、坚守屈辞非赋之说”^⑤。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① [日] 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以《离骚》等为“骚赋时代”（王冠辑《赋话广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6册，第460页）；马积高《赋史》论“屈原是赋体作品第一个重要作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谓“辞赋又可看作一种文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辞赋大辞典·前言》谓“辞赋乃古典文学之一种特殊体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 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62页。

③ 张正体、张婷婷《赋学》，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7—9页。

④ 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47页。

⑤ 分别参见郭建勋《汉人观念中的“辞”与“赋”》（《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与《中国赋论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现实的情况仍然很混杂,各种楚辞与赋的选本及研究论著,或称屈宋作品为楚辞、“屈赋”,或称汉及以后赋为“辞赋”、“词赋”;或以“赋”名书而“辞、赋”兼收,或以“辞赋”名书而专论赋^①: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对于“楚辞”与“赋”的分合,或者说对于“辞赋”或“辞”与“赋”的文体认识,到底能不能形成较为明确的看法?今后的辞赋研究以及普及性的辞赋选本,能否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范围,并减少不必要的学术重复呢?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较为全面地考察自汉代以来赋体论述的发展历程,努力透过纷繁的表象去探索事情的本来面貌及其主流趋势,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一 辞赋不分:两汉赋论落后于汉赋创作的理论尴尬

汉代是赋的兴盛期,也是辞赋文体论述开始活跃的时代。在汉代之前,楚辞作品并不称之为“赋”,苟况是文学史上最先以“赋”名篇的作家。除今本《荀子》所载《礼》、《知》、《云》、《蚕》、《箴》五赋外,《战国策·楚策四》亦载录有苟况致楚春申君书时“因为赋曰”的“宝珍隋珠、不知佩兮”等14句“赋”文^②。此外,《汉书·艺文志》尚著录有“唐勒赋”、“宋玉赋”及“秦时杂赋”等,应都是以“赋”名篇的作品。这说明自战国末以至秦代,“赋”作为一种新文体的名称已经出现。降及汉初,贾谊则是第一个为自己的作品冠以“赋”名的重要人物。贾谊是苟况授《春秋左传》的再传弟子^③,同时,在思想上也比较接近于荀子。他继承苟况的礼治思想以论治国之道,如其代表性的政论文《治安策》,不仅多处言“礼”与“礼义”,篇中如谓“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④,强调礼义与“积”的作用,就连用词也几乎与《荀子》相同。于是,这位极富文学才华和创新精神的洛阳才子,紧承其师祖苟况之后且沿袭其“赋”篇之名和设为问答形式^⑤,创造出有别于楚辞的“赋”体作品,并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汉赋”时代!这似乎既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必然,也是汉代赋家要着意开创一代新文体的实际表现^⑥。然而,与作赋者具有以“赋”名篇、别“骚”为“赋”的主观创意不同,汉代论赋者(包括既写赋又以论赋者身份出现的人)对这一新文体,则表现出相对滞后和矛盾的模糊认识。

一方面,面对苟况、宋玉、贾谊等楚汉作家大量以“赋”名篇的创作,同样也是赋家的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班固等论赋者,均持普遍接受的态度,以不同的形式给予了载记和承认。如司马迁既在《史记》中称贾谊“为赋以吊屈原”,又全文载录《吊屈原赋》和《鹏鸟赋》,自己还创作有《悲士不遇》等赋;班固不仅在《汉书》中为赋家立传并原文载录其赋,而且也创作有影响深广的《两都赋》等。但是,另一方面,汉代论赋者又在《诗》之“讽谏”的旗帜下,通过重新解读而强调《离骚》等作品也和汉赋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刺、讽谏精神,从而“拉近骚、赋

① 如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巴蜀书社2010年版;王琳《六朝辞赋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第567页。这段“赋”文,即《荀子·赋篇》“诡诗”的末段,故刘向《孙卿书录》有“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之说。

③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序疏》引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703页)又《汉书·儒林传》:“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皆修《春秋左氏传》。”

④ 贾谊《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5页。

⑤ 如苟况《赋篇》设为“臣、王”对问,其中《云赋》曰“君子设辞,请测臆之”;贾谊《鹏鸟赋》亦设为“鸟、我”问对,而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模拟之迹,十分明显。

⑥ 马积高谓贾谊是一个在艺术上“勇于创新的人”,“《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承《九章》,但……具有战国策士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鹏鸟赋》更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赋史》,第60页)。

的距离”^①，将楚辞纳入赋的范围，以“辞”为“赋”，或辞、赋不分。司马迁是第一个将《诗》之“讽谏”纳入辞赋领域的批评家。他在《司马相如列传》及《太史公自序》中，批评司马相如赋“多虚辞滥说”、“靡丽多夸”，却充分肯定《子虚赋》、《大人赋》“其指风谏”，“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在评论楚辞作品时，则强调《离骚》具有“讽谏”的动机和内容，所谓“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而不满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②。通过这样的一番解读，司马迁似乎找到了“辞、赋”的共同点。于是，他既在《酷吏列传》谓朱买臣以“楚辞”与严助俱幸，又在《屈原列传》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扬雄也是如此，他既以“讽谏”作为其“四赋”创作的目的和基本内容，也将意存讽谏的楚辞作品称之为“丽以则”的“诗人之赋”（《法言·吾子》）。再到刘向、刘歆《七略》，以及班固据《七略》“删其要”而作的《汉志·诗赋略》，更可谓两汉以“辞”为“赋”文体论述的完成。《诗赋略序》以“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③的理论为依据，直接把屈原作品著录为“屈原赋”。在班固的心目中，赋也原本就是一种“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政治功利性载体，在国家政治文化中具有“不可阙”（《两都赋序》）的重要地位；而屈原“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④，其精神实质正与汉赋相通。所以，班固也既在《艺文志》著录“屈原赋”，又在《地理志》、《贾谊传》中称《离骚》为“离骚赋”，又在《朱买臣传》、《王褒传》沿袭《史记》而有“楚辞”之称。

除以“辞”为“赋”外，汉人还常有“辞赋”连称及“赋、颂”通称之例^⑤。“辞赋”连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景帝不好辞赋”，《汉书·王褒传》载宣帝刘询言“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班固《离骚序》谓屈原“为辞赋宗”^⑥，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称“书画辞赋，才之小者”^⑦等等。但是，这些“辞赋”连称，其主流不是指“辞”与“赋”两种文体，而是单指“赋”。如景帝“不好”之“辞赋”和蔡邕“才之小者”云云，就不会包括屈原楚辞在内。如上所述，汉人或以“辞”、“赋”、“楚辞”等概念指称屈原作品，或以“辞赋”指“赋”，还有“赋、颂”通称和以“颂”称赋，这说明汉代对辞、赋文体的论述尚处于相对模糊的认识阶段，在“辞、赋”等概念的运用上颇有随意性。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也有对“辞、赋”的最初区分和探讨。如刘向集、王逸注《楚辞章句》，专录屈宋楚辞及汉人拟骚作品而不收以“赋”名篇之赋^⑧，这对后世“楚辞”类目的设立及“辞、赋”二体的区分有深远影响。此外，如《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赋心”、“赋迹”之说，刘熙《释名》谓“敷布其义谓之赋”，郑玄《周礼·春官》注曰“赋之言铺”，《汉志·诗赋略》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等，均可看作是对赋不同于“诗”或“辞”的艺术特征的初步认识。

面对汉赋的勃兴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司马迁等两汉文人积极参与作赋，并普遍使用了“赋”的文体概念；但是，当他们以评论者的身份来论赋之时，则表现出认识落后于创作的理论尴尬：一方面，他们以儒家“诗”教所认定的“美刺”、“讽谏”作为评鹭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通过重新解读来弥合骚、

① 徐华《班固对汉赋的改造与六朝典雅文范的生成》，《湖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② 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册，第2491页。

③ 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56页。

④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⑤ 在汉代，赋与颂是两种文体，如刘向、王褒、扬雄、班固等均二体兼作。但仍有“赋、颂”通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并言“《大人赋》”与“《大人之颂》”，《汉志·诗赋略》著录“《孝景皇帝颂》”等。

⑥ 《楚辞补注》，第50页。

⑦ 范曄《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册，第1916页。

⑧ 虽《楚辞章句》卷一二《招隐士序》仍有“分造辞赋”及“作《招隐士》之赋”之语，但该篇并未以“赋”名篇，后萧统《文选》亦以《招隐士》为题列入“骚”类。

赋的区别,从而以“赋”的概念包括楚辞;另一方面,当发现“讽谏”的实际作用有限,所谓“劝百讽一”乃至“欲讽反劝”之时,又以“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说,将楚辞与汉赋相区隔。而《楚辞章句》的编辑,司马相如、刘熙等人对于“赋”体特征的认识,则代表着两汉赋体论述的发展方向,并由此揭开了此后“辞赋异体”的历史序幕。这正是我们分析汉人辞、赋观念的一个重要视角。

二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魏晋六朝赋体独立意识的形成

魏晋六朝的赋体论述,在儒家“诗教”观念削弱和文体论发展的大背景下,逐渐从偏重讽谏、美刺的传统脱出,走向真正从艺术角度审视的转变期。此一时期,虽然还遗存有“诗赋”、“辞赋”连称现象^①,但其主流意识却是在注目于赋“体物”、“铺陈”等体制形式、艺术特点的探讨,廓清与诗、辞等文体的外部关系,从而形成“诗赋不一”、“骚别于赋”的“赋”体独立意识。

在汉人提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之后,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也颇多承继其说。但魏晋六朝论赋者与汉人已有不同,他们所言之“诗”已不全然专指《诗经》,也不再偏重“讽喻之义”的思想内涵,而是注意到一般诗、赋文体在艺术形式上的特点及同异。魏晋之时,先有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的著名论点,以“丽”来概括诗、赋作品追求文辞美丽的共有特质。其后,更有成公绥、左思、陆机等,从赋“铺陈、体物”的特点切入,进一步分析了诗、赋的不同之处。《晋书·文苑传》载成公绥《天地赋序》曰:“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这寥寥数语,道出赋贵在敷写事物及事物之“理”,可以对天地万物致“思”,突显了赋“敷演”、“赋物”的特点。这种亦“理”亦“思”的论赋话语,遥承荀况《赋篇》原本就有的赋“物”意识,又与当时嵇康《琴赋》“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庾敳、庾亮叔侄关于《意赋》“有意无意”的论辩相通,可谓是魏晋玄思理趣风尚在赋体论述中的具体表现。其所谓“敷演无方”,是强调铺陈事物的丰富与无限性,而不是汉儒所重的“铺陈政教善恶”,有如清刘熙载所评“司马长卿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成公绥《天地赋序》“意与长卿宛合”^②。左思、皇甫谧的两篇《三都赋序》,也分别论述了赋不同于诗的特点。左思谓“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是强调赋应“依其本实”的体物叙事的创作原则;皇甫谧指出赋为“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的“美丽之文”,则是表明对赋铺陈事物、展示巨丽之美的肯定。挚虞是皇甫谧的弟子,释“赋”亦受其师影响,如其《文章流别论》谓“赋者,敷陈之称……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虽然文中尚有“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今之赋以事形为本”^③的褒贬之词,但其论赋有“敷陈”物事的特点,仍很明确。而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④,则是从艺术角度分析诗赋的不同。这与“诗缘情”相对的“赋体物”之说,有两层含义:赋的基本内容和表现方式是“体物”,赋的风格形态或文辞特色是“浏亮”。正所谓“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绮靡,精妙之言;浏亮,清明之称”^⑤。陆机“赋体物”命题的提出,阐明“陈事、体物”之赋与“言志、缘情”之诗有不同。当然,陆机主张赋体物,并未排斥言志与抒情。他不仅在赋中屡屡用“缘情”这样的词语^⑥,而且还

① 如曹丕《典论·论文》“王粲长于辞赋”、曹植《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皇甫谧《三都赋序》“近代辞赋之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辞赋之英杰”、萧统《金楼子·立言》“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其中,除萧统之说外,其余诸说均单指赋而非“辞、赋”二体。

②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

③ 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七七,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9页。

④ 陆机《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⑤ 李善注《文赋》语,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241页。

⑥ 如《思归赋》曰“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叹逝赋》曰“乐颓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

写作过不少情理兼备的抒情赋。但是,从总体上说,陆机的赋还是以“体物”者居多,“触物生端”(《思归赋》)、“何物不感”(《怀土赋》)的抒情赋创作,并没有模糊他对“诗缘情、赋体物”的基本认识。降至南朝,范晔既在《后汉书》中大量载录赋体作品,也在有关传记中分体记载传主所作诗、赋。而刘勰《文心雕龙》,则分列《明诗》和《诠赋》两篇,既诠释“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铺采摘文”^①的文体特征,又指出荀、宋之赋“爱锡名号,与诗画境”。萧统更在《文选·序》中提出“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②的编辑原则,明确表达了诗、赋异体的主张。

六朝论赋者在论述“诗、赋体既不一”的同时,还阐述了“骚别于赋”、赋始于宋玉(或荀况)的辞赋观。如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载“自诗、赋、《离骚》至于势,约凡八十五题”^③,不仅以“赋”与“诗”及“《离骚》”并列,而且在该书序论中提出“赋,楚大夫宋玉所作”,“《离骚》,屈原所作”^④的观点时,还有裴子野的《雕虫论》谓“若徘徊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⑤,也是将楚骚与汉赋分题而论的。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还是刘勰和萧统。《文心雕龙》中,虽然尚有“辞赋”连称之例,如《辨骚》言“名儒辞赋”,《情采》谓“近师辞赋”,《比兴》云“辞赋所先”,《指瑕》说“辞赋近事”,《时序》说魏文帝“妙善辞赋”及明帝“振采于辞赋”,《才略》篇说“赵壹之辞赋”等等。然而,这些“辞赋”连称,均是指“赋”或赋家,而并非“辞、赋”二体并列。刘勰是“辞、赋异体”论者,其《辨骚》篇谓楚辞“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词,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其《诠赋》篇论赋的形成,“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然赋以“客主”问对形式开端、极力描摹事物情貌,真正与诗、辞分离出来,则始自“荀况《礼》、《智》,宋玉《风》、《钓》”。刘勰的这些见解,强调诗、辞、赋的不同之处,抓住赋铺陈、体物的基本特征,找到了赋与荀、宋的渊源关系,从理论上划清了赋与诗及屈原楚辞作品的文体界限。

梁普通年间,萧统编辑文学总集《文选》,其《序》论辞赋的形成与发展云:

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

又楚人屈原……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萧统以为诗、赋殊体,骚亦不同于赋。骚多“壹郁”、“憔悴”之情,赋多“纪事”、“咏物”之作,故其论赋的创始谓“荀、宋表之于前”,然后再另述屈原楚辞以说明“骚人之文,自兹而作”,从而为《文选》骚、赋分载立论。于是,《文选》编辑先秦至梁代各体的文学作品,首列“赋”,次列“诗”,而后录“骚”即楚辞作品。从而在汉人辞赋不分之后,正式将赋与诗、骚分别开来。历史上虽不乏指责《文选》“赋先于诗、骚别于赋”^⑥的讥议之声,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至为深远,如明胡应麟谓“《文选》分骚、赋为二,历代因之”^⑦;近人钱穆亦言萧统将“宋玉与荀卿并举,列之在前,顾独以骚体归之屈子,不与荀宋为伍,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⑧。

两汉之时,除楚辞总集《楚辞章句》之外,专门的赋集并未出现。这一状况,在魏晋六朝得到了改变。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晋宋至梁,除继续编辑“楚辞”注本,更选编前所未见

①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1页。

② 《文选》,上册,第1—2页。

③ 永瑒等《四库全书总目·文章缘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780页。此处所谓“势”,乃《文章缘起》举例崔瑗《草书势》而言,古今有将“势”误作“艺”者,当据改正。

④ 任昉《文章缘起》,《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78册,第206、208页。

⑤ 严可均辑《全梁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5页。

⑥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页。

⑦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6页。

⑧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的“赋集”达四十一种之多！其中如“谢灵运撰《赋集》、崔浩撰《赋集》、梁武帝撰《历代赋》”等，篇幅都在十卷以上。除赋集之外，还有赋注，如郭璞注《子虚上林赋》、萧广济注木华《海赋》等；赋注之中，又有赋家自注的，如谢灵运自注《山居赋》、张渊自注《观象赋》之类。大量专门的赋集、赋注的涌现，既表明时人对赋的重视，也充分证明“辞、赋异体”已经是当时文士的共识。总集之外，又有书目著录之例。在魏晋六朝之前，《汉书·艺文志》将屈原作品著录为“赋”。时至梁代，阮孝绪所撰《七录》，却在《文集录》创立“楚辞部、杂文部”等四个部类，“楚辞部”著录楚辞，赋集则著录在“杂文部”内^①。《七录》一改《汉志》辞赋不分体例，将楚辞与赋分门别类。这又说明：至南朝萧梁，不仅选文家分体收录辞、赋，目录学家也将楚辞与赋作了清晰的区分。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当时“骚别于赋”的时代风尚在目录学领域的反映。

三 以赋论赋：由古律之辨至古、俳、律、文四体的深化

唐宋以后，无论赋的内容、形式，还是地位、功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这赋论史后半段的赋体论述也因时而变，在前承六朝“辞、赋异体”的独立意识之时，更将主要的注意力投向赋体内部，即在“以赋论赋”的前提下转入对赋本身类的分析，从而最终形成了由赋分“古、律”到确立“古赋、俳赋、律赋、文赋”诸体的科学认识。这是古代赋文体论述史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分野。

首先，书目、诗话坚守“辞赋异体”之说。古代正史的七部史志中，最早将楚辞著录为“赋”的是《汉书·艺文志》。有意味的是，这部古典目录史上堪称典范的巨著，其以“辞”为“赋”的著录实例，却没有对唐宋至清的另外六部史志产生影响。唐代初年，魏徵等撰《隋书·经籍志》，即已近承梁人《七录》之例，正式确立“楚辞”类著录楚辞，而将晋宋以来大量“赋集”著录在“总集”类，从而开启了古代史志“辞、赋异体”的范例，“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②。自此以后，唯《明史·艺文志》删“楚辞类”并入“总集类”，其余《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皆继承《隋志》，设“楚辞”类著录楚辞，在“总集”类著录“赋集”。其中，《旧唐志·序》还记载有唐《开元四部类例》阐述《隋志》分类体系及其类目的定义性界说云：“楚词以纪骚人怨刺，别集以纪词赋杂论”，表明唐代目录学家对于楚辞与赋这两种文体原本就是有意区分的。南宋郑樵所撰《通志·艺文略》也是一部“史志”类的目录书，其中，“赋”与“楚辞”亦在“文类”分类著录。

官、私书目也大抵如此。私人藏书目录，如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分别立“楚辞”类著录楚辞，在“总集”类著录赋集。明代的祁承燾“对分类最有研究”，其《澹生堂书目》亦在“辞赋”的总名下再列“骚”、“赋”二目分别著录^③。《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最有影响的代表性官修书目，同样也是在集部设“楚辞”类著录楚辞，在“总集”类著录赋集。

图书目录之外，诗话、赋论及清代赋集，也多坚持“辞、赋异体”者。宋代诗话，如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所载《示客》一文，分析文体七十余种，其中谓“采摭事物，摘华布体谓之赋”，“幽忧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吟咏情性，总合而言志谓之诗”^④，就分别论述了“赋”及“诗、骚”诸体的不同特点。明代诗话，区别诗、骚、赋体的论述更是丰富，如谢榛《四溟诗话》认为“诗、赋各有体制”^⑤；

① 《七录》今佚，《隋书·经籍志》载有《七录》分部题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载《七录序》及《目录》。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谓：“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辞》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文史通义校注》，第298页）

③ 何新文《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48页。

④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上册，第475页。

⑤ 谢榛《四溟诗话》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1205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以为“骚、赋^①，虽有韵之言，其于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同时，还指出“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胡应麟在其《诗薮》中，也很注重骚与赋的不同，如说“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文选》分骚、赋为二，历代因之。名义既殊，体裁亦别”（杂编卷一）。他在明确骚、赋“要皆属诗”的前提下，肯定它们是两种“大不同”的“体裁”，且详论各自在形式、风格和手法上的不同之处，可谓深入而全面。清代诗话、赋话及赋选家的赋体论述，虽然如浦铣、姚鼐、张惠言、刘熙载等还墨守着辞、赋不分的传统^②，但是，从总体上说，坚持“辞、赋异体”仍然是赋论的主流。如清初吴景旭《历代诗话》以乙集论楚辞、丙集论赋（《赋话广聚》，第1册）；康、乾以来许多影响深广的知名赋集，如赵维烈编《历代赋钞》、王修玉编《历朝赋楷》、陆棻编《历朝赋格》、陈云龙编《历代赋汇》、王冶堂编《历代赋钞》、鸿宝斋主人所辑《赋海大观》等，亦皆选录荀、宋以来之“赋”，而不收屈原楚辞。至于程廷祚《骚赋论》专论诗、骚、赋的体制异同，以为“骚则长于言幽怨之情，赋能体万物之情状”，“骚主于幽深，赋宜于浏亮”，进而提出“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③，则更具有代表性。

其次，赋格、文集开启赋分“古赋”、“律赋”之辨。“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④清代赋家的这一说法，道出了赋体论述史上一次重要而深刻的变化：缘于“律赋”这种因科举试赋而起的新兴赋体。一些敏锐的论赋者意识到：“赋”不仅与诗、骚等其他文体相异，而且同为赋体，这些讲究命题限韵和声律对偶的短制“新赋”，也与以往那些散体单行、不限韵脚的古赋有别。于是，以中晚唐时“古赋”与指称律赋的“甲赋”（新赋、新体）之名的出现为标志^⑤，开始了在赋体内部分辨“古赋、律赋”的新阶段。而白居易的《赋赋》，和现存最早的赋格书《赋谱》，即是中晚唐之际开启赋分“古、律之辨”的最重要文本。《赋赋》（以“赋者古诗之流”为韵）是以律赋形式写成的律赋专论。此赋开篇先言“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概述唐以前楚汉古赋的发展；接着又谓“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讲的就是当时律赋要求适度的声律、偶对之美的文体特点。

佚名氏《赋谱》^⑥，则相对应地叙论了“新赋”和“古赋”的不同形制。《赋谱》“以赋拟人”^⑦，以人的“身体”比喻律赋的结构章段，分律赋为“头、项、腹、尾”四段（“腹”一段更分“胸、上腹、中腹、下腹、腰”五节）。又比照“古赋”，叙论律赋的句式、对偶、赋题，以及八段八韵、篇幅三百六十字等问题。如谓“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古赋，段或多或少”，“至今新体，分为四段”；又说“新赋之体，项者，古赋之头也”，古赋“自宋玉《登徒》、相如《子虚》之后，世相放效，多

① 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第962页。此“骚、赋”一语，《续编》本及当下论者多“骚赋”连称，恐非是。王氏总提“骚、赋”之后，又分论“骚辞”、“作赋之法”与“拟骚赋”，可见他是区分“骚”、“赋”及“骚赋”的；后《诗薮》引此段文字，明确区分为“骚与赋”，亦可证之。

② 姚鼐《古文辞类纂》“辞赋类”《序》曰“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而首录《离骚》等楚辞作品；张惠言《七十家赋钞》，选录《离骚》以下至庾信所作206篇辞赋，而不及律赋。

③ 《赋话广聚》，第3册，第774—776页。

④ 陆棻《历朝赋格·凡例》，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⑤ 唐代尚有“词（辞）赋”连称，如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斯又词赋之罪人”，李白《江上行》“屈平词赋悬日月”。但运用最多者还是“赋”及“古赋”、“甲赋”等概念，如权德舆《答柳福州书》、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舒元舆《上论贡士书》均提到过“甲赋”，刘禹锡编《柳河东集》用到“古赋”。“律赋”之名或始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九谓郑隐“少为律赋”（姜汉椿《唐摭言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⑥ 佚名著，张伯伟校考《赋谱》，《赋话广聚》，第1册，第11—27页。

⑦ 钱锺书《谈艺录》曾论“中国文评特色，谓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假设之词”，贞元以来律赋则“不用假设”等，已具体实际地启动了对于楚汉以来“古赋”与“新赋之体”律赋体类特点的比较分析。两宋论赋者，除晁补之《续楚辞》、朱熹《楚辞后语》等，尚沿袭着“《离骚》为词赋祖”^①的传统外，大都承唐人之说分赋为“古、律”二体相对而论。诸如，李昉等编《文苑英华》，收“赋”150卷而以律赋居多；此后，王禹偁又批评“隋唐始以科试取进士，而赋之名变而为律，则与古戾”（《答张知白书》），与王禹偁同时的姚铉，因不满世传唐代类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就编辑《唐文粹》专收古体诗文，其中“古赋”录九卷而不及律赋。再有，《师友谈记》载秦观论律赋之语^②，专论律赋声律对偶、用字练句等形式特点，且以“今赋”与“汉赋”对举；王观国《学林》则列“古赋题”、“古赋序”诸条，专论古赋；郑起潜撰《声律关键》，总结科场试赋而论“五诀、八韵”的律赋作法；金元之际元好问《遗山集》收赋体作品，则只编入“古赋”一卷：这种或只收古赋、或专论律赋的现象，偏重一体，各有轩轻，当然体现着唐宋以来“古、律之辨”的赋学论争，但究其赋体意识，却可谓殊途同归，均是在“以赋论赋”，“古、律”相分。

唐宋以降，赋分“古、律”的影响仍然很大。尤其是入元以后，先有刘埙《隐居通议》，相对六朝唐宋的骈律之作而论“古赋”。嗣后，又有祝尧《古赋辨体》谓“唐人之赋，大抵律多而古少”，以及明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以古今“正变”之旨而谓“律赋为古赋之变”。降至清代，陆蕙最早提出“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的著名论断。此后，邱士超《唐人赋钞总论》称唐人“未免古赋少而律赋多”；鲍桂星《赋则·序》称“赋有古、有律”，又《凡例》曰“古赋或工体物，或尚抒情”，“自唐以之取士而律赋遂兴，然较有规绳，尚存风格，今欲求为律赋，舍唐人无可师承”^③。同治间，李元度《赋学正鹄·序目》以“古赋、律赋”概念叙论赋的体制源流，谓“其体肇自荀卿、宋玉。自周秦汉魏至六朝，皆古赋也，唐以诗赋取士，始有律赋之目”，又说“赋学有源有流：汉魏六朝之古体，源也。唐宋及今之律体，流也”。他将历代赋概括为“古、律”二体，而以荀、宋为赋体肇始，可谓是赋体论述史上赋分古、律的最为简明清晰的表述。

最后，古赋、俳赋、律赋、文赋之分体，实缘于“辨体”风气之影响。自宋至明，文学批评界盛行“辨体”之风，所谓“文章以体制为先”，“文莫先乎辨体”^④的言论不绝于耳。受其影响，元明两代《古赋辨体》、《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三部以“辨体”为旨归的著名文章总集^⑤，在唐宋赋分“古、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化，又形成了“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的赋体认识。祝尧的《古赋辨体》以“辨体”名书，虽本着“复古之体”的目的，而一反前人“骚别于赋”和“赋体物”之说，提出赋“必本之于情”的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准，并以此衡量楚辞及两汉至唐、宋赋的不同价值，得出“汉以后之赋出于辞”，“以至三国、六朝之赋”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但他却创造性地提出了“严乎其体”和“以赋为赋”、“以赋论赋”的赋学主张。在评鹭历代辞赋之“时代高下”时，他又从语言句式、对偶韵律等形体要素具体分析，又每以“古赋、俳体、律赋、文体”等名称言之并论辩诸赋体的特点，则实际上已前承唐宋“古、律”二分，后开明人古赋、俳赋、文赋、律赋的“四体”之法。明代，先有吴讷所编《文章辨体》，列“古赋”为“正体”以叙论楚辞及汉、唐、元、明赋，列“律赋”为变体以概述律赋及其“音律谐协、对偶精切”等特点，而在叙论过程中，又袭称祝尧“俳体”、“文体”诸说。后有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已与吴讷的“辞、赋”不分和“骈、律”无别不同：他区分“楚辞”与“赋”为二体，又“进律赋”于正编，再在“赋”的名义下，将两汉至宋元之赋分成

① 祝尧《古赋辨体》卷一、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古赋》、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楚辞》均引为“宋祁云”。

② 李昉《师友谈记》，《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又有孔凡礼点校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③ 鲍桂星编《赋则》，《赋话广聚》，第6册，第135—138页。

④ 宋倪思、明陈洪谟语，《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81页。

⑤ 祝尧《古赋辨体》，《赋话广聚》，第2册；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参见《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明代尚有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文体名目多至132类，因不及诗赋，故不论。

“古赋、俳赋、文赋、律赋”四体，“弃时代概念而不用，进而专以赋的体式特点作为分类的依据”^①，从而在前人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完成了赋体论述由实用随意向科学转化的历史进程，其影响十分深远。

文章总集而外，三代的文体论著及文话、赋话、赋集，均有突破“古、律”二体，而推衍至三分、四分或五分的赋体论述。元初陈绎曾《文筌》中的《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及《唐赋附说》，就涉及“楚赋、汉赋、唐赋”和“古赋、俳赋、律赋”等两类六种概念，均分“赋法、赋体、赋制、赋式、赋格”五个方面，论及各体赋作的创作方法、体制、结构、句式及风格品第。从形式体制的角度看，所谓“楚赋、汉赋、唐赋”，均非特指某一时代之赋，而是一种突破时代界限、旨在推尊“古赋”的衡赋标准，如其“汉赋体”不特指汉赋，而是包括荀、宋及汉、晋“以事物为实”的赋；“唐赋体”，是指唐代“古赋”和“俳赋”，不包括“律赋”。清代的赋集及文学批评论著，如康熙时，王修玉《历朝赋楷选例》论“古体为赋家正格”，“俳赋、律赋、文赋”为“赋体之变”；《御制历代赋汇序》论赋“创自荀况”以及汉赋之后，再论“三国、两晋以逮六朝变而为排，至于唐宋变而为律，又变而为文”^②；陆棻《历朝赋格》将律赋归入骈体，凡分“文赋、骚赋、骈赋”三格；王之绩的《铁立文起》通论文体，而谓“赋自古、俳、文、律之外，又有大、小之名”^③。乾隆间，鲁琢编《赋学正体》，分为“骚赋、古赋、文赋、律赋”四体^④；孙梅《四六丛话·叙赋》论“古赋一变而为骈赋”，“自唐迄宋，创为律赋”，“又有骚赋”，“又有文赋”^⑤；王敬禧《复小斋赋话·跋》论“骚体矫厉而为古，古体整练而为律，律体流转而为文”的“四体”之赋^⑥；李调元《赋话》多处转述汤聘《律赋衡裁》论“古变为律”之说；王芑孙《读赋卮言》，既列《审体》、《律赋》诸篇，又谓“自唐以前无古赋、俳赋、律赋、文赋之名，今既灿陈，不得不假此分目”^⑦。还有道光间林联桂《见星庐赋话》袭陆棻之说，分“古赋之体”为“文赋、骚赋、骈赋”三类^⑧。诸如此类，均可看出唐宋赋分古、律及明人辨析古赋、俳赋、文赋、律赋“四体”的影响。

四 理论贡献与启示：对于赋体特征及其分类的科学把握

古代赋文体的论述，不仅揭示了从“辞、赋不分”到“以赋论赋”的学术历程与发展规律，而且在正确把握赋体特征及其分类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当下的辞、赋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均具有清晰而深刻的启示。

古代学人根据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学状况，在与诗、辞等其他文体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逐渐地或者说是累积式地形成了关于赋体特征的全面认识。第一，赋属于“诗”之一体。班固《两都赋序》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说明这已是班固之前就有的看法。自此以后，这种观点就在古今“赋源说”中占主要地位，如刘勰《诠赋》谓“赋自诗出”，祝尧《古赋辨体》谓“为赋者固当以诗为体，而不当以文为体”，徐师曾辑《文章纲领》论赋之语均入“论诗”篇，胡应麟《诗薮》谓“赋则比兴一端，要皆属诗”，程廷祚《骚赋论》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叙》云“赋者，诗之体也”。总之，赋属于诗，它以整齐的诗句为主，是大致押韵的韵文。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有如美学家朱

① 《赋学概论》，第56页。

② 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③ 王之绩《铁立文起》，《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4册，第324页。

④ 鲁琢编《赋学正体》，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

⑤ 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0页。

⑥ 浦铣著，何新文等校证《历代赋话校证》（附《复小斋赋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

⑦ 王芑孙《读赋卮言·小赋》，《赋话广聚》，第3册，第325页。

⑧ 林联桂著，何新文、余斯大、踪凡校证《见星庐赋话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光潜所云：“就体裁说，赋出于诗，所以不应该离开诗来讲（赋）。”第二，赋体物叙事。赋自“爰赐名号”之始，荀况《赋篇》就确立了“象物名赋”的文体特征。此后，如《汉志·诗赋略》说“感物造端”，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谓“物以赋显”，陆机《文赋》谓“赋体物而浏亮”，刘勰《诠赋》谓“体物写志”、“写物图貌”，程廷祚《骚赋论》说“赋能体万物之情状”等等，均突出了赋在内容上叙事、体物的特点，而与以“言志”、“缘情”为主的诗及楚辞有不同。故近现代学者，如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有“屈原言情、孙卿效物”，朱光潜《诗论》有“赋是状物诗”之认识。第三，铺陈手法。汉刘熙《释名》谓“敷布其义谓之赋”，郑玄《周礼》注曰“赋之言铺”，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曰“赋者敷陈之称”，至刘勰《诠赋》综合前人之说而谓“赋者，铺也，铺采摘文”。此后，对赋的铺陈特点给予充分论述者，尚有刘熙载《赋概》所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赋博也”，“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赋，诗之铺张者也”。铺陈之法，原本不是赋所独具，但在宋玉以至汉赋作品中，则把铺陈的表现手法发展到了极致，连篇累牍、多侧面、全方位地铺陈事物几成楚汉赋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这正是赋在艺术形式上明显区别于此前之诗、辞和后起之词、曲等的突出特点之一。

此外，尚有“不歌而诵”，“设辞问答”，讲求对偶声律和命题限韵等特点。“不歌而诵谓之赋”，《汉志·诗赋略》本于《七略》的这种说法，后人多所承之，如晋皇甫谧《三都赋序》谓“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今人朱光潜《诗论》说“赋可诵不可歌”，马积高《赋史》则力主此说“为探本之论”。设辞问答，亦是唐前古赋的特点之一，如荀况“五赋”首段均设为问答，以“臣愚不识，敢请之王”（或“君子设辞、请测臆之”）之类句式领起；宋玉《风赋》及《高唐》、《神女》诸赋之首段，大抵设为楚王与宋玉问对；至汉晋，《鹏鸟》、《七发》、《子虚》、《上林》，及《两都》、《二京》、《三都赋》等，莫不以设为问答形式开篇，故刘勰《诠赋》总结道：“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祝尧《古赋辨体》卷三论“赋之问答体”，“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而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序例》篇，则以宋玉《高唐赋》“之发端”，为“汉人假事喻情，设为宾主之法，实得宗于此”。至于讲求四六句式及对偶声律，乃至命题、限韵等，则是后来骈、律之赋的特点。古代学人关于赋体特征的上述认识，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从体制上看，赋是诗之一体。虽早期赋韵散相间、亦诗亦文，但是“非诗非文”；从内容、题材上看，以体物叙事、讽谏颂美为主；从形式上看，设辞问答、铺采摘文，乃至讲求对偶声律和命题限韵，追求雅丽典则之美。

古代论赋者在对赋进行分体、分类之时，也不断探索总结了赋体分类的标准和方法：（1）有按作者分者，如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志·诗赋略》之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2）有按题材分者，如《文选》分赋为“京都、郊祀、耕籍、音乐”等15类，后世因之而有所增减者甚众。然如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先分为“言情、体物”两大部分，再将“体物”之赋分为30类、将抒情言志之赋分为8类；诚如四库馆臣所谓“《正集》分三十类，凡有关于经济学问者，悉以次登载；《外集》分八类，则缘情抒慨之作，并别见焉”^①。再如张维城《分类赋学鸡跖集》^②，将所收清代各体之赋先分为“天文、岁时、地理”等“三十门”，再于每门之下又各分若干类目，总共150类，则均已将赋的题材分类至二级类目；（3）有按体裁（体制、体式）分者，如唐宋以来的古赋、律赋之分，明徐师曾的“古、俳、文、律”四体；（4）有按时代先后分者，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谓“楚辞之赋”与“今之赋”，王修玉《历朝赋楷》所分“周、两汉、三国、晋、六朝、唐、宋、元、明、国朝”之赋；（5）有按内容、风格分者，如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依其“体势”分为“叙事、颂德、纪功、缘情、咏物”等20门，李元度《赋学正鹄》分为“庄雅、沉雄、博大、高古”等10类^③。然而，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62页。

② 张维城《分类赋学鸡跖集》，清道光十二年（1832）新选，梨花吟馆珍藏本。

③ 李元度《赋学正鹄》，清同治十年（1871）爽溪书院校刻本。

对于赋体分类最有理论探讨和研究发明者,尚属祝尧与陆棻。祝尧《古赋辨体》关于赋体分类,主张既“因时代之高下”,又“因体制之沿革”的双项标准,故在其书中,既“因时代”而分“楚辞、两汉、三国六朝、唐、宋”等“五体”,又“因体制”而有“楚骚、古赋、俳体、律赋、文体”等名目。而具论各代之赋时又突出有代表性或新兴的体式,如论“两汉体”以问答体为主,论“三国六朝体”以俳赋为主,论“唐体”言“律多而古少”,论“宋体”以文赋为主:这实际上就兼顾了“时代”和“体制”(形式)两方面的因素。陆棻《历朝赋格》录战国至明代的赋,分类体例更独辟蹊径。其《凡例》云:

作赋以来,选家不一。有多别门类者,有专叙朝代者,有分列体裁者……今既分三格以为之纲,又分五类以为之目,而类分之中,仍以朝代为之前后。

前代赋选家的编辑体例不一,或多别题材门类,或专叙作者朝代,或只列形式体裁。而陆棻此选,统合前人分类之法,既按“体裁”而“分三格(即文赋格、骚赋格、骈赋格)以为之纲”,又别题材“门类”而“分五类(即天文、地理、帝治、人事、物类)以为之目”,而类分之中,仍以作者“朝代”为之先后,从而形成一种以体式类别为“纲”、以题材类型为“目”,又注明作者朝代的新分类方法,全面包涵了“别门类、叙朝代、列体裁”等三项标准^①,使读者能在辨析体类之时,也了解不同时代的创作状况及题材传承演变之迹。这是赋体分类史上最为周备和有特色的一个范本,为古代赋文体的分类作出了宝贵的理论贡献。

中国古代的赋体论述,虽有循环反复,但总的趋势却是由模糊混沌走向清晰明朗。全面考察这个历史流程,总结前贤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足以为当下仍然众说纷纭的辞赋文体认识及其学术研究提供借鉴:首先,是总体把握古代赋论在与诗、文等其他文体的比较中,累积形成的关于赋体特征的认识,从体制上明确赋是诗之一体。研究者可以在“韵文史”里论赋,而不必将赋纳入“散文”的范畴^②。如果既像有的赋史将楚辞列入其中,又有人将赋包含在散文史内,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人为地在“扩大自己的地盘,造成不少交叉重复”^③,而且也会显现出“韵、散不分”的概念模糊,造成分文体的诗史、赋史、散文史边界不清的结构性矛盾。其次,认清古代赋体论述的基本趋势,是由两汉的辞赋不分、魏晋六朝的骚别于赋,最终走向唐宋以后“以赋论赋”的科学道路。所谓“辞赋”连称,多半单指“赋”而不是“楚辞”与“赋”。因此,在“辞、赋”关系上,要遵循古人已经揭示的体类特征,明确“赋虽祖于骚,而骚未名曰赋”,“赋终非骚”^④。从而区分“辞、赋”二体,以荀、宋而不是屈原为赋体之始;楚辞应该而且已经作为诗歌一体进行专门诠释和研究,不必再置之于“赋”的范围之内。最后,赋体分类,要在“以赋论赋”的前提下,综合祝尧、陆棻等人所总结之“别门类、叙朝代、列体裁”的科学方法,全面考量赋的内容题材、作者时代、体裁形式等三方面的要素(尤其侧重“体裁”形式)来区分所谓“古赋”、“骈赋”、“律赋”、“文赋”乃至“俗赋”等赋体类别。若诚如是,则当代赋文体的认识,就有可能更加合理和科学化,进而纠正辞、赋不分的概念模糊,减少选赋、论赋范围的混乱和不必要的交叉重复。

[作者简介] 何新文,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中国赋论史》(与苏瑞隆、彭安湘合著)等。

(责任编辑 孙少华)

① 陆棻所谓“门类”,相当于《文选》的以题材分类,“体裁”则如祝尧所谓“体制”。

② 在“散文”范围内论赋者,如刘盼遂、郭预衡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刘跃进《散文史研究中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④ 《古赋辨体》卷九“外录”上“后骚”,《赋话广聚》,第2册,第492页。